

客运站建成10年未用，背后是公共责任空转

据《人民日报》报道，黑龙江绥化市王先生反映，当地东城客运站作为绥化市向社会公布的惠民工程之一，总投资3600余万元。然而，该工程2015年建成后一直未启用，市民搭乘长途汽车仍在破旧的老客运站，十分不便。

记者调查发现，王先生反映的事的确存在。而除了东城站，另一座耗资5000余万元建成的六合站，2015年底建成

后，仅运营了一年多就因亏损关闭。

如果说东城站的“烂尾”主要源自项目落地过程中的“不作为”，那么，差不多同时建成的六合站在运营不久后便关停，则更多与决策源头的失当有关。

按照当地的说法，六合站的建设依托于新区规划，但最终新区未获批便仓促上马，导致六合站投运后因客源不足被关闭。这样的结果，看似有客观原因，实则暴露出决策过

程中对市场规律和新区建设本身风险的尊重与判断不足。

一定程度上说，这座耗资5000多万元却最终关停的新站，实际成了公共决策的“试错成本”。这样的成本实在太高。

（摘自《新京报》8.19）

悬崖 假期游名山，视野所及，尽是人山人海。此次名山之行，主要是听朋友说这里的悬崖十分震撼。朋友说，悬崖是两座山之间看似极近却遥不可及的距离，具有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美，甚至有些残酷。我被这番话吸引到了山上，却被川流不息的人群挤到了一旁，等我好不容易挤到悬崖边上，却被拍照的游人破坏了兴致。在如此热闹的地方，根本无法静下来感受朋友口中所说的悬崖。

无奈之下，我停下脚步，有些茫然地看着四周的陌生人。突然，我发现了另一种悬崖。这里山挨着山，人挤着人，两座山与两个人之间不都是一道道或大或小的悬崖吗？

山不会触碰对面的山，人也无法了解对面的人，都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一道看似狭窄实则深不可测的悬崖。我被这个发现震撼了，突然觉得此行不虚。因为我确实看到了悬崖，而且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悬崖。

我放慢脚步，有意无意地与身旁的行人聊天。大多数人行色匆匆，对我的搭讪有些敷衍，但也有少数人像是找到了知音，甚至有几个人还停下脚步与我攀谈起来。停下来的是老人，匆匆忙忙走过的多是中年人，有些年轻人虽然不会停下来，但对交谈表现得非常热情。

原来，悬崖并非难以征服。那些与我一般的中年人也许是被生活的压力裹挟，总是有着莫名的浮躁，老年人则因为时间宽松喜欢与陌生人交谈，而年轻人总是充满活力。我与三者之间确实有着悬崖，但因为我迈出了第一步，让这座悬崖也变得不再难以逾越了。

事实上，真正的悬崖只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由人与人之间的戒备与冷漠切割而成。当一个人放下戒备抛开冷漠，便可以跨过悬崖收获一道融化人心的美丽风景。

（摘自《今晚报》石兵/文）

直闲置至今。

如果说东城站的“烂尾”主要源自项目落地过程中的“不作为”，那么，差不多同时建成的六合站在运营不久后便关停，则更多与决策源头的失当有关。

按照当地的说法，六合站的建设依托于新区规划，但最终新区未获批便仓促上马，导致六合站投运后因客源不足被关闭。这样的结果，看似有客观原因，实则暴露出决策过

程中对市场规律和新区建设本身风险的尊重与判断不足。

一定程度上说，这座耗资5000多万元却最终关停的新站，实际成了公共决策的“试错成本”。这样的成本实在太高。

（摘自《新京报》8.19）

画与理



些伤是成就是你的勋章。有
（摘自《思维与智慧》陈英杰/图、文）

亨与享

小时候写作文，我经常把“亨”与“享”弄混，但是有一次受到母亲的责备时，我却强辩说：“亨跟享只差一点点嘛。”

“怎么能说差一点点呢？”母亲说，“亨少那么一画，就不能成为享。好多有钱的大亨，一年到头忙着赚钱，就因

（摘自《萤窗小语》刘墉/著 漓江出版社）

凡人，亦动人

你我皆凡人。

只要是凡人，必有所牵绊。没有放肆的自由，甚至被日复一日相似的劳作、生活拖累。然而，也是凡人，能够沉于洪流之底，一如田埂的秋菜、地里的麦子，噌噌向上生长。那股最深处动人的力量，其实是本能。

不囿于过去，不彷徨现在，不奢求未来，只是自然而然地生长。是花就长成花，是麦子就长成麦子……

想起曾经读茶人李曙韵的《茶味的初相》，身为茶人，她以茶事悟人生。

有一次她和友人相约品一泡老茶，几轮过后，除了感受到老茶的沉着气韵，

我未曾拥有显赫的家世，却从父母布满老茧的手上，接过了人类最古老的遗产：在苦难中开凿光明的勇气，在岁月里淬炼生命的韧性。

——一位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身穿学位服，和正在田野里收割麦子的父母视频通话，而他的感言更让人动容

循此苦旅，以抵繁星。

——拉丁文谚语，也以莫尔斯电码的形式储存在“旅行者”号探测器所携带的金唱片中

传说之所以总能撩拨人心，就是因为它们过于符合人性的期待。

——传说里充满了伯乐与千里马相遇相知的美谈、相识于微时的情谊、被世人嫌弃时的不甘、悔不当初的遗憾以及皆大欢喜的美好结局

人生不一定要往高处走，也可以往四处走。

——往哪里走，都是向前

（摘自《新周报》）

的“凡人精神”。

它让我想起我的祖母。我常常和别人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既不是英雄伟人，也不是明星偶像，而是我的祖母。老太太没有上过学，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结婚早几年，祖父带她去了一趟他长大的地方——上海。然后，没几年祖父因病早逝，祖母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成人、成家……她看上去就是那样一个平平静静的老太太，待人和气、行事小心，但她的能量于一生的克制、隐忍之中，你觉得是那样隆重和盛大。

你很难说，哪一种是对待生命最好的态度。

一如茶，用生命做赌注，对未来亦只能面对，接受并且承担。可回过头想，茶之本能，或就是一种生命

（摘自《意林》谁最中国/文）

为何“老赖”还能坐一等座出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被执行人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乘坐交通工具时不能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能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以及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

记者梳理发现，不仅在宜兴、宁夏银川、广西柳州、湖南浏阳等地也发现“老赖”违规乘坐高铁、飞机出行？

“老赖”照样坐上一等座

2024年9月全国检察系统数字检察模型比赛，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核查出3名江苏宜兴地区被限制高消费的“老赖”购买高铁票、飞机票出行线索，并向宜兴市检察院提交。进一步核查发现，其中一人购买高铁票、飞机票出行40多次。

以此案为鉴，宜兴市检察院今年开展了一项专项监督行动，对2018年以来宜兴市人民法院作出限高令的6103名被执行人进行摸排，发现有502名被执行人在限制高消费期间，使用护照购买并乘坐飞机、G字头动车组列车、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8000余次。

通过对当地被限制的被执

行人持有护照数进行调查，发现其中111人办过5本以上护照，1人竟办过10本护照。

——换护照了法院不知道，被限高了公安不知道。受访人员表示，不同部门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尚有待完善，法院无法及时掌握被执行人新办或补办护照信息，公安机关也不知晓申请办理护照的人员是否属于被限制的被执行人，从而形成“身份证件被锁，护照仍自由”的漏洞。

——“人无影、车无踪”，法院找人不轻松。被执行人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的，依法应予以拘留、罚款。司法拘留等惩戒措施本可以给规避限高的被执行人形成威慑，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法院执行局往往面临“找人难”。一些“老赖”跟法院玩“躲猫猫”，如果法院执行局想掌握被执行人的行踪轨迹，还需依托公安力量；如果“老赖”去了外地，应组建公检法专班，调查其购买车票、异地住宿的资金来源，查明该账户的资金流水，查找其隐匿的可执行财产，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做到办理一案、震慑一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被执行人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乘坐交通工具时不能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能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以及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

——护照编号不唯一，换本护照就可以。法院的限高措施虽能绑定被执行人的护照，但仅能关联限高决定作出时被执行人已持有的护照信息。由于护照与公民身份证件不同，被执行人每新办或补办一次护照，即可获得一本新护照，同时拥有一个新的护照编号，从而能够规避限高规定。

宜兴市检察院和桥检察室副主任王敏介绍，通过对当地被限制的被执

票、飞机票的问题，办案检察官认为，公、检、法之间应建立被限高的被执行人的信息查询联动机制，各单位确定工作联络部门和专职联络员，明确信息协查的范围、手续和程序，规定协查完成时间等。同时，公安与法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限高人员信息实时交互机制，确保公安掌握他们的名单，这样就能在发现他们新办或补办护照时及时阻止或第一时间通知法院执行局。

构建公、检、法打击拒执违法犯罪联动机制。办案检察官认为，对于查实违法的被限高的被执行人，由法院执行局依法作出司法惩戒，公安机关安排专人负责配合法院执行局开展人员查控、拘留收押等工作；对于高频次购买高铁票、飞机票出行的被执行人，应组建公检法专班，调查其购买车票、异地住宿的资金来源，查明该账户的资金流水，查找其隐匿的可执行财产，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做到办理一案、震慑一片。

针对被执行人新办或补办护照后即可用于购买高铁

（摘自《半月谈》2025年第15期 朱国亮/文）

缝纫机与透析机：尿毒症患者以工养医

病人与工人

距离广州市中心20公里，一家五层民营透析中心临街坐落。楼内运转着一个精密的医疗工业系统——四层是服装厂，58名尿毒症工人在此工作，日产能最高可达两千件；二三层是透析室，50台透析机并列排开，可供200人轮班透析；一楼是理疗室，为病人提供推拿按摩服务。电梯入口，挂着街道办事处颁发的“爱心工厂”证书，上面写着“帮助病人回归社会”。

在广州这不是个例。3年来，边打工边透析的外地尿毒症病人，占据数十家民营透析中心近半数床位。他们在这座城市，开辟出以工养医的生存路径，也过上抱团取暖的集体生活。

生计和尊严

得病前，张顺(化名)在沿海各地的制衣厂打工，换来县城的一套房；得病后，他又在各地辗转求医，最后，需要终身透析的他，困在老家，坐吃山空。与张顺一样，工人们的



根据中国肾脏疾病数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我国有超200万尿毒症病人，其中大陆地区透析患者总数达118.3万例，年新增患者约2万人。大量乡镇县城尿毒症病人，仍面临着就业、就医和经济上的困境。

面目是相似的。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乡镇或县城郊区，工作在运转着一个精密的医疗工业系统——四层是服装厂，58名尿毒症工人在此工作，日产能最高可达两千件；二三层是透析室，50台透析机并列排开，可供200人轮班透析；一楼是理疗室，为病人提供推拿按摩服务。电梯入口，挂着街道办事处颁发的“爱心工厂”证书，上面写着“帮助病人回归社会”。

在广州这不是个例。3年来，边打工边透析的外地尿毒症病人，占据数十家民营透析中心近半数床位。他们在这座城市，开辟出以工养医的生存路径，也过上抱团取暖的集体生活。

老板的生意

2022年，兼任透析中心老板和服装厂厂长的贺军(化名)看准尿毒症病人就业难的痛点，在透析室楼上办起制衣厂，帮助病人以工养医。此后，靠安排就业吸引来的透析患者，占据了客源总数的大半，一度萧条的透析中心得以起死回生。

这样的生态里，民营透析中心和病人是彼此依存的。一方面，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食宿、就业、补贴等福利，为病人提供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靠福利吸引来的病人，又为透析中心带来医疗营收。也正因为这样的福利，使这个生态圈始终处在规则的灰色地带。

“什么规则，没有规则，规则就是活下去”，张顺坦言，比起老板，他更担心工厂的存续，他想在这里干一辈子。“如果这样的就业模式，能从广州

推广出去，我们找工作就没这么难了。”一位工人病友说。彼此惦记 在这片开辟出的领地上，尿毒症病人建立起自己的语言体系，健康人叫“正常人”，健康的工人叫“普工”，而病人互称“肾友”，一些病友继而发展成情侣，圈里叫“透析搭子”。分散在不同透析中心的老乡会彼此惦记，“隔段时间就打个电话，就怕人消失了。”

这样的车间，工人流动率极高，据贺军统计，来来往往有过百人，大部分不超过3个月就离开，通常，他们在提供不同福利的透析中心间试探、流转。

张顺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对于他来说，最务实的生存法则是，“可以病，不能病态，也不能太病。”他反复把这句话解释给新来的年轻人：“我们是有病，但不能病恹恹躺平，肾坏了脑子没坏；也得照顾好身体，身体是本钱，本钱没了，都是白玩。”

（摘自《新京报》8.13）